

委內瑞拉政局與未來大選

王建勳

壹 委國政局的演變

基督教社會黨候選人凱蒂拉 (Rafael Caldera) 當選總統的原因之一。

在委內瑞拉歷史上言，一九一〇年代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因為在這時

委內瑞拉發現地下蘊藏豐富的石油。從一九二〇年起，委國即鼓勵英、美油商在委內瑞拉開採石油，委國石油產量大增，經濟亦就跟着繁榮起來。

經濟的繁榮更促使政治的進步。在一九四〇年間，一股自由主義的潮流結束了哥默斯 (Juan Vicente Gomez) 長期獨裁的統治。一九四一年民主行動黨成立，一九四五年開始執政，中間雖經過多次軍事政變，但終於使委內瑞拉的民主政治走上正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民主行動黨創始人貝當古 (Romulo Betancourt) 再度當選總統，他力求政治安定，組織聯合政府

，民主政治更趨穩固。

至一九六一年，因為共黨勢力增強，社會開始不安，加以「石油國有化」初起爭論，民主行動黨內部意見頗為紛歧，政治亦起動盪。在一九六一年間，單以美國在委內瑞拉石油企業投資已達三十億美元，委國人民就認為委國在財源外溢，而又需要大量製成品進口，不但使貿易條件日益不利，並且亦嚴重損害了國內經濟成長。此外，工人工資過低，農業仍屬落後，全國半數以上人口是文盲，這些都成為貝當古總統推行民主政治的阻力。所以一九六三年大選，民主行動黨總統候選人李昂尼 (Raul Leoni) 雖以極高票當選，但卻是在共黨騷亂中進行的。

李昂尼就任總統後，極力加強黨內團結，並聯合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在對付共黨方面，他利用共黨內部鬥爭的矛盾，採取剝撫兼施政策，以雙管齊下的方法，一時牽制了共黨武裝叛亂的擴張。但親蘇的傳統派共黨却乘機滲透，並對民主行動黨進行分化，而使民主行動黨內部分裂，以致在一九六八年大選期間，民主行動黨出現三位總統候選人，各不相讓。這亦是造成

貳 委國石油經濟的發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委內瑞拉石油工業的發達，使其經濟更為蓬勃，無疑石油生產已給委內瑞拉的經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民主行動黨政府的國家預算，大部份來自於石油，而地方政府亦依靠石油工業所提供的機會開創大眾服務事業，社會亦愈加繁榮。所以不但在一九六七年，委內瑞拉國民所得即達八百美元，已接近工業化國家的水準，並且在拉丁美洲很多國家通貨膨脹聲中，委內瑞拉的幣值迄今一直保持穩定。

然而委內瑞拉的石油經濟亦逐漸的顯露出很多的弱點：由於石油不僅是委內瑞拉的經濟命脈，亦是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而使得歷屆政府長久以來只注意到石油的生產，却忽略了農、工業的價值。就以委內瑞拉國民生產總值來看，石油與其他農、工業生產在比例上相差很遠，並且那些工、商及大眾服務事業亦均是依附着石油工業所提供的機會而發展。

第一 部 門	第二 部 門	第三 部 門
農業 7%	工業(手工業) 14.5%	交通運輸 4%
礦業 1%	建築 4.5%	商業 14%
石油(包括提煉) 27%	水電 2.0%	大眾服務 26%
總計 35%	總計 21%	總計 44%

附註：因為工業部門係屬手工業，所以礦業之開發與石油之提煉均包括在第一部門的數字之內。

表列數字，其中石油生產與提煉所需之勞動力僅佔全部勞動力的百分之一。而大眾服務的勞動力却佔國民生產總值的26%。且其中有百分之五十是直接或間接與石油工業有關。如此委內瑞拉的輸出就完全依靠石油工業，其中有92%為石油化工業。所以委國整個經濟發展，必須要在石油生產與輸出不斷增加才可以保持。

但是近年來，由於委內瑞拉太過於重視國際石油市場的價格，而忽略了石油礦藏的繼續勘查與開發，加以美資盈利很少再作投資，更減少了油井的開鑿。委內瑞拉在以前，每年可開鑿六百個油井，而今不足一百個了，以致在一九六八年起，原油生產減為一億八千八百萬公噸，已不能維持一九六五年世界第三石油生產國的地位了。不但委內瑞拉石油生產已不能配合經濟快速的發展，並且從一九六〇年迄今，十數年間國民生產總值雖然增加了30%，但是委國人口亦增加了27%。事實上，委內瑞拉的國民所得，迄今仍保持一九六七年的水準。

另方面，農業不能獲得鼓勵，一般工業又缺乏資金，當然就容易引起社會問題。這亦是委國政府雖經常以經濟繁榮的邏輯來強調政府的威望，但却無法掩蓋其社會所呈現的危機。就如由於石油生產，委國農民為找尋比他們耕作收入較高的工作，乃紛紛向都市及石油噴出的地方發展，因而使全國一千萬人口當中有百分之七十都集中在都市或產油的地方。不但農村人口外流，農業發展受到傷害，並且城市人口擁擠，生活不易，就容易產生各種社會問題。加以農業不能改革，國家資源及財富分配不均，其所造成的貧富懸殊，社會歧視亦愈來愈深。在委內瑞拉的農村，現在仍有忍受飢餓的人民。而一般工資過低；粗工每月只賺到二百至四百個波立華（Bolívar），相等於五十至一百美元。而一般大眾服務的工作，每月只有一百波立華。在這種情形下，大多數工人為了增加收入，不顧勞累的自動延長工作時間，有些婦女必須要參加工作，導致棄嬰與私生子幾佔全國出生率的一半。加以國民教育尚不普及，文盲仍多，一些高等教育的水準與特性，亦不能配合國家建設及技術發展的需要，這些都是委國在集中於石油工業發展下的缺點。

參 當前委國政府面臨的難題

現為委國總統的凱蒂拉是基督教社會黨的創始人。他在二十年中曾四次競選總統，三次失敗。一九六八年大選期間，凱蒂拉在競選中不斷誇耀智利「自由革命」的方法，並提出社會改革的口號，來迎合國人對民主行動黨的不滿，而當選總統。誠然，以凱蒂拉本身之優厚條件，尤其在知識領域中還是一位教育家，使其在拉丁美洲有着很好的聲望。但是凱蒂拉執政四年期間，却因為基督教社會黨在國會中沒有多數席位，在政府經常面臨與國會艱苦鬥爭中，難以有何作為，因而他在競選時的諾言，可以說並沒有實現。相反的，他在左右兩派夾攻之下，顯得更為軟弱。目前最使凱蒂拉總統感到困擾的；一是石油國有化的爭論，一是學生騷亂所造成的社會不安，因為這兩個問題都顯示着委國的政治可能發生劇變的危機。

一、世界第一石油輸出國的委內瑞拉，它的石油很早即為外資所開發。自一九五八年始，貝當古政府為避免外資壟斷，曾以契約及組合方式加以控制，以使國家資本亦參加到外國公司當中。一九六一年七月，委內瑞拉創立國家石油公司，開始一部份石油獨立經營。惟迄今委內瑞拉石油生產，仍有83%是由美國標準石油公司所屬克勒俄里（Creole）、海灣（Gulf）、殼牌（Shell）、大麥納（Mene Grang）等幾個公司所提供。其他如德克薩斯（Texas）、菲力浦（Philips）、辛克力（Sinclair）幾個石油公司亦佔一小部份。

在委國獨立經營的石油生產方面，有92%是輸往國際市場，因而委國中央銀行外匯收入，有90.6%是來自於石油。近年來，由於委內瑞拉在歐洲及美國石油市場遭到中東及阿拉伯國家的競爭，委內瑞拉石油輸出量，從一九五八年的60%，已降到一九六八年的41.7%。並且因為美國已在阿拉斯加開發重要油場，委內瑞拉在美國的石油市場還繼續遭到威脅。尤其是委內瑞拉石油輸出，在歐洲受到挫折以後，更加對美國的依賴，使委內瑞拉的經濟前途，將完全決定於華盛頓的石油政策。

凱蒂拉總統為打開國際石油市場，其與中東石油國家談判，尚無結果，並且輸往美國的石油却繼續減少。在一九五九年，委國輸往美國的石油，佔美國全部進口石油的49%，而經過十數年以後，迄今已降到24%了。

一九七〇年六月，凱蒂拉總統到華盛頓訪問，曾直接與尼克森總統談判有關修改石油協定，以及對美石油輸出等問題。最後除華盛頓允許增加委國

十二萬桶的石油輸美配額，對於委國輸入美國的石油並沒有提供更好的保證。

一九七一年三月，凱蒂拉政府對難以保證石油市場穩固情形下，乃把美資開發石油的出口稅率從52%提高到60%。六月又制定「石油國有化」的法令，規定委國與外國石油公司所簽訂的石油租讓協定，在一九八三年期滿後，一切財產均收歸國有。然而，此項緩慢的石油國有化措施並未能消除左、右兩派對凱蒂拉政府的不滿。因而為保護外國石油工業投資始能維持委內瑞拉在國際上的經濟地位與必須要排除外國資本以保障民族主義經濟之發展間的爭論仍舊存在。尤其是在凱蒂拉政府提高石油出口稅率以後，美國的石油投資更為減少，當然亦直接影響到委國的石油生產，更招致委國人民的反感。所以凱蒂拉就在排除外國資本與保持美國仍是委國石油輸出最大主顧之間，頗感左右為難。而左、右兩派對「石油國有化」的叫囂，却使委國政治不斷發生激盪。

由於石油國有化的爭論以及經濟與社會結構的缺失，青年欲造成一種改革的風潮，更增加了委國政治的混亂與社會的不安。因為委內瑞拉憲法賦予大學生具有不可侵犯的自治權利，所以政府對於學生運動，起初都未予干預。一九六四年，經過共黨的滲透，學校已成為共黨建立叛亂中心與藏身的庇護所，尤其是首都卡拉加斯大學已成為共黨招募和訓練游擊隊的大本營。因此，委國政府乃打破傳統，實行管制。於是派軍佔領各大學實行鎮壓。惟此一行動却又招致了學生的反抗，經常演變成學生與軍警衝突，而造成流血事件。至一九七一年四月，左派與右派均鼓動「學生運動」，使學生示威發展到所有各大城市，並且亦蔓延到中學的學生，在軍警鎮壓中的數次學生示威活動，就有一百多人死傷，八百多人被捕。目前委國的學生運動仍繼續惡化，凱蒂拉總統不僅已擔心「學生運動」將會在一九七三年大選前造成更多困擾，並且學生暴亂在其黨操縱下，亦可能演變為共黨欲達成的城市暴亂。

首先從蘇俄的態度來看：一九六七年十月，古巴共黨頭子蓋瓦拉在玻利維亞被擊斃，拉丁美洲共黨「武裝革命」，顯然已有失敗的象徵。蘇俄要使拉丁美洲共黨繼續生存，即乘機鼓勵共黨以合法手段爭取政權。一九七一年十月，智利社會黨領袖、馬克斯主義信徒以「左派擴大陣線」在大選中獲勝，此一左派聯合競選的策略，即普遍為南美洲國家所運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烏拉圭大選，烏國共黨所發動的「左派擴大陣線」在選舉中僅獲得17%的選票，而未得逞，所以蘇俄就期望委國共黨在一九七三年大選中能奪得政權力所造成的失敗，不免有些共黨份子對於採取「武裝鬥爭」方式進行革命發生懷疑，而主張放棄「武裝鬥爭」路線。李昂尼總統就利用了共黨內部矛盾，採取一種剝、撫兼施政策，以雙管齊下的方法，而企圖使親蘇共黨與卡斯楚主義共黨兩派擴大分裂，藉以削弱共黨武裝叛亂的實力。因此，李昂尼一方釋放一些親蘇共產黨徒，試圖妥協，一方展開大規模的剿共行動，迫使共黨恐怖份子退出山區。至凱蒂拉總統就任，他為期使共黨武裝叛亂終止，更對共黨「民族解放陣線」發動一項「和平運動」，由紅衣主教漢伯圖（José Humberto Quntero）居間與「民族解放陣線」的共黨頭子普拉多（Douglas Brando）進行談判。凱蒂拉為接受武裝叛亂共黨的和平條件，在一九六九年聖誕節，曾以大赦令釋放了一百卅三名共黨武裝叛亂份子。但事實上，無論是主張「武裝鬥爭」或「政治革命」的共產黨徒，其企圖都是要破壞現狀，製造混亂，以打擊民主政治的威信。尤其是在一九六八年大選以前，由於委國共黨政治局有效運用着以「合法革命」的手段，在國內政治上進行分化、統戰等陰謀，已使執政達八年之久的民主行動黨內部擴大分裂，而最後在大選中失敗。一九六八年以後，凱蒂拉總統對共黨的安撫，既無法保證共黨武裝叛亂的再起，亦不能控制共黨「政治鬥爭」陰謀的發展，相反的，在委國共黨為求適應特殊的環境，更深入羣衆，使委國的政治面臨空前的危機。

肆 一九七三年大選前的共黨陰謀

蘇俄對於拉丁美洲的「和平演變」策略，在南美洲而言，仍是以委內瑞拉為主要目標。因為委內瑞拉在資源上是重要產油國，在地勢上，委內瑞拉面臨加勒比海，並且亦是通往歐洲的重要航道，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至少

，如果蘇俄控制了委內瑞拉的石油，它即可在世界石油戰略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但是蘇俄一方要排除美國的勢力，一方又要取得它對這個地區的特權——就像蘇俄與東歐附庸國的關係一樣，其陰謀已形顯露。所以委國親蘇共黨內部對於與蘇俄的關係亦由爭論而分裂。

委國共黨在一九五〇年間，曾被獨裁者貝萊士(Marco Perez Jimenes)所嚴厲禁止，當時兩個重要共黨頭子法里亞(Jesus Faria)及瑪蓋斯(Pompeyo Marquez)均已入獄，直到一九六二年才被釋放。法里亞被釋放後即往莫斯科，瑪蓋斯就成為委國共黨的首領。一九六八年以後，委國親蘇共黨已由地下轉為公開活動，而吸收了很多青年進入共黨陣營。但是此時委國親蘇共黨對於蘇俄軍事干預捷克事件起了強烈的反應：在繼續親蘇與重建新的「社會主義運動」間開始爭論。在這項爭論中，共黨重要人物法里亞及瑪查多(Gustavo Machado)仍主張走蘇俄的路線，而彼托哥夫(Teodoro Petkoff)及瑪蓋斯均主張走向一個新的社會主義路線。

一九七〇年七月，委國共黨召開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親蘇共黨份子企圖排斥分裂派而告失敗，彼托哥夫與瑪蓋斯就乘機號召委國親蘇共黨份子

要適應共黨必須改革的潮流，主張廢除「教條主義」，脫離蘇俄的干預及影響。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委共召開從一九六一年以來的第四屆共黨大會，兩派共黨之爭論更為惡化：彼托哥夫與瑪蓋斯獲得多數親蘇共黨之支持而奪得了共黨政治局，委國「新共黨」即在委國共黨分裂中而產生。委國「新共黨」的理論是說：委國共黨的路線不能以一己的好惡作決定，這是因為共黨用之於革命只是一種工具。它在軍人、社會、青年，以及宗教均欲改變現況的潮流中，共黨必須要適應這種情況的變遷。所以他們就主張使委國共黨成為唯一具有領導人民革命的力量，在新的潮流中，必須要有開明的作風，以容納那些湧向改革的廣大羣衆。

但是委國「新共黨」的分裂運動亦冒着與蘇俄衝突的危險。因為蘇俄認為在委國共黨再分裂方面，是不能使其成為反對蘇俄的一種力量。所以蘇俄於委共四十週年紀念時，在給予法里亞的賀電中，即聲明蘇俄仍繼續支持委國親蘇的兄弟黨，並譴責委國「新共黨」的分裂與「機會主義」已嚴重影響了共黨的團結。一九七二年一月，兩派共黨均召開了共黨大會，結果「新共黨」却爭取到委國共黨百分之六十的共黨份子。新共黨在此次共黨大會中，

以自由選舉的方式，選出兩倍於以前當權的新，而徹底革新了共黨的陣容。

委國共黨的再分裂，對於一九七三年的大選是一個重要關鍵。因為委國共黨在一九七〇年間已開始聯合所有左派政黨成立「人民陣線」，並在一九七一年，蘇俄與委內瑞拉恢復外交關係以來，已獲得蘇俄在委國使館的支援，對於一九七三年大選的影響成為重要的一環。但是委國「新共黨」為了要聯合除了左派之外，所有「民族主義運動」、「學生運動」以及「宗教運動」等廣大羣衆，亦必須要適應他們對蘇俄的反感。並且「新共黨」認為左派聯合競選策略，委國親蘇共黨在一九六八年大選中曾經採用，結果並未成功，僅獲百分之十九的選票。所以最近彼托哥夫、瑪蓋斯及該黨政治局的一些共黨頭子們如托瑞斯(Eloy Torres)、安東尼奧(José Antonio Urbina)等發表一項聯合聲明，內中自詡為「民族主義共黨」，強調「社會主義運動」，並宣告國人表示「新共黨」不再走蘇俄的路線。所以「新共黨」不但已削弱了委國親蘇共黨的力量，增加了共黨左派「人民陣線」的困難，其所產生的一種「酵母」作用，已使委國政治起了很大的動盪。

伍 對未來大選的展望

無論是左派或右派，其勢力的擴張似乎均與委國的經濟、社會等結構有關。尤其是凱蒂拉總統的諾言未能實現，更使委國人民對基督教社會黨反感。例如貝萊士所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自一九五八年，十四年以來，因受國內政治的壓制，幾乎已完全消失，而今却藉着「石油國有化」的爭論又告東山再起。「民族主義運動」的目標不僅要打擊民主行動黨或基督教社會黨，而且要結合所有反對派力量，在一九七三年大選期間，進行一場激烈的政鬥爭。而親蘇共黨不但已使走中間路線的民主行動黨和基督教社會黨內部分化，實力衰落，並且它們亦要藉一九七三年大選使委國政治與現實政府殊多不同的劇烈改變。

目前基督教社會黨尚未有振興的表現。民主行動黨創始人貝當古，在他離國六年以後，已回到委內瑞拉，他現在已為民主行動黨發動一項革新運動，並準備親自參加大選。委國親蘇共黨(P.C.V.)的左派人民陣線可能推

出「左派民主共和聯盟」維魯帕(Jovito Villoba)，或「人民革命運動」的格拉哈哥(Paz Galarago)出面競選。貝萊士所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如果不參加「新共黨」或「左派人民陣線」，即可能由前委國國防部長加西亞(Garcia Villasmil)出面角逐。目前各政黨已成勢均力敵，據估計，無論中間派、左派或右派，均可獲得百萬以上的選票。

由於未來委國政情的可能變化，其大選結果，目前尚難預測。不過，左右兩派都要以一九七三年大選作為委國政治的重要轉捩點是一致的目標。這

批准「俄德」與「波德」兩條約的重大意義

王 啓 升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同西德總理布蘭德在莫斯科所簽訂的蘇俄同西德互不使用武力條約，以及同年十二月七日波蘭部長會議主席西倫凱維茲同西德總理布蘭德在華沙所簽訂的波蘭同西德「關係正常化基礎」條約，經一年五閱月至十閱月的拖延，終於在本(一九七二)年四月由蘇俄議會聯盟院同民族院的外交委員會聯席會議對「俄德」條約審查通過，五月卅一日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批准；同年五月西德議會對上述兩條約復完全批准。這不僅是蘇俄近年對歐洲和平攻勢所獲得的勝利，亦為俄德、波德，乃至東西德國之間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對歐洲命運與安危，對世界大局，乃至對人類未來的發展遠景，均有極其深遠的重大影響。蘇俄自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對德簽訂了布列茨克和約以來，對兩次世界大戰的主角——德意志民族時懷戒心，認為歐洲問題的關鍵，是德國問題，唯有搞好同德國的關係，歐洲其他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這不僅說明蘇俄對德國問題的態度，亦充份顯示出德國問題對歐洲大局是何等重要。

本年四月十二日暨十七日，蘇俄議會聯盟院同民族院的兩個外交委員會舉行為時兩日的聯席會議，來審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所交議的「俄德」條約。此兩日會議，均由聯盟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擔任主席。此次會議有一重要特點，即所有在會議上的發言人，均一致贊成批准「俄德」條約。尤以外交部長葛羅米柯的開場白暨蘇斯洛夫的結論，更是很堅定表示蘇俄的態度，除了建議「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批准該項條約外，並以嚴肅的語氣警告西德國會，一定要批准該項條約，否則會產生很嚴重的後果。在這個中間，葛羅米柯同蘇斯洛夫，對蘇俄和西德以往的關係，及「俄德」條約為什麼能夠順利簽訂及其重要性，均有扼要的敘述。茲分別將葛羅米柯同蘇斯洛夫發言的主要內容介紹如次：

一、葛羅米柯發言的主要內容

蘇俄外交部長葛羅米柯，係代表蘇俄政府出席會議。在四月十二日上述聯席會議開始時，蘇斯洛夫首先請其發言。葛羅米柯開始敘述自一九四九年九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以後，聯邦政府的統治集團即在推行復仇主義的政策，企圖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形成的結果，而恢復一九三七年德國當年